

哈里曼回憶錄涉及的中國事（中）

范興國

羅氏猝逝世局變遷

(中) 哈里曼回憶錄涉及的中國事

一九四五年四月上旬羅斯福總統遽然謝世，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哈里曼本欲在羅斯福去世前一週自莫斯科飛返華府，向羅面報有關最近蘇俄甚難實行雅爾達若干決定的情形，尤其他代表羅斯福向史交涉務請在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創立聯合國的會議開會時，派遣莫洛托夫出席參加，遭到拒絕，史拒絕的理由是最高蘇維埃即將集會，莫洛托夫必須留在莫斯科。這時，哈里曼仍迅速回華府會晤新總統杜魯門，向杜報告新的情勢，特別是杜必會向他垂詢羅在生前所處理有關世界戰局的幾個主要問題，而這幾個主要問題的底牌如何？因哈里曼每皆隨羅參與其事，只有他才能向杜報告詳情。可是，國務卿斯泰汀紐斯却不同意哈里曼飛返華府，他獲得杜魯門的同意後，仍要哈里曼繼續在莫斯科要求

杜魯門派莫洛托夫到舊金山來開會；哈氏只好應命辦理。本來史大林不要莫洛托夫赴舊金山開會，也只是故作姿態，後來經哈里曼再請求，也就答應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正是羅斯福總統埋葬海德公園後的第五天，哈里曼首次由史泰汀紐斯陪同晉謁杜魯門總統，杜魯門當即要哈里曼將與盟國與蘇俄之間最迫切的問題開列呈閱。哈里曼特別向杜魯門總統報告，蘇俄在此一時期同時推行兩個矛盾的政策，即一面拉攏英、美的合作，另一面又亟欲謀求對東歐鄰近國家的控制。至在遠東方面，霍浦金斯認為韓國的將來，尚是一個未定的問題；因為一旦將韓國境內的日本驅逐後，韓國的善後問題，如何處理，頗值研究，他提到這一問題曾經美國政府研究，認為最好的答案，就是由盟國對韓國托管一個時期，托管時間最短為五年或十年，最長亦不超過二十五年，以使韓國步向一個獨立的國家。托管國家包括中、美、英、蘇四國，過去羅斯福總統在世時，史大林曾同意美國這一提議。設若今日史大林要改變當日的承諾，則將影響中國。在霍浦金斯的備忘錄中，提及馬歇爾將軍及海軍金上將，此時皆亟關懷蘇俄何時對日作戰。在雅爾達時，史大林承諾於德國投降後二或三個月內，對日作戰。可是，現在霍浦金斯則說，美國在遠東的軍隊

將在當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進入作戰準備位置，然實際作戰行動的日期，乃要基於史、羅祕密協定的執行，以及執行此項協定，又要徵詢中國蔣委員長的同意。設若蔣委員長接受了史、羅祕密協定中若干政治的要求，那麼蘇俄紅軍即可在同年八月對日作戰。

霍浦金斯就其回憶言，以前的羅斯福及眼前的杜魯門，皆欲在與蔣委員長磋商有關問題之前，先要得到史大林的承諾，史大林乃認此種作法無誤。於是美國政府當局遂同意將此一問題延遲告訴蔣委員長，直到蘇俄的大軍開向遠東戰場的途中。現在霍浦金斯想到了，應將這個問題直接與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一談，他預期宋子文出席舊金山會議後，將訪問莫斯科。

霍浦金斯看赫爾利大使，在中國調停國、共紛爭的問題，然而他自己却欣賞史大林的觀點，就是如何使得中國的統一，得到實現。實則，這是霍浦金斯受了史大林的欺騙，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國。可是，史大林對霍浦金斯的答覆，是他對中國並無特別的計劃。他所能參贊的，是使中國應該成為一個穩定的、完整的國家，而非在一個

國家內形成諸侯割據的局面，宛若十九世紀的德國。中國需要經濟的援助，此種援助，亦僅僅只有美國才可以提供。

史大林稍後應哈里曼的詢問時，又將上述他自己的看法，加以闡述：

「美國必須盡最大的力量，幫助中國使之站立起來，蘇俄則須埋首其國內的重建工作，英國亦復如此。霍浦金斯說，他希望史大林元帥瞭解，美國在中國及遠東並無意具有獨佔他的利益；而且美國並不希望看到任何其他的國家排拒在門外。」

史大林元帥回答說，他完全理解，而且其個人原意所指，亦即僅僅只有美國具有足夠的物資與人力，在戰後立即給與中國以實際的援助。」

哈里曼便以上述史氏的觀點，來測探蘇俄對滿洲國以及其他地方的政治設計，到底如何？舉例言之，如果赫爾利調停國、共問題遭致失敗，則蘇俄的大軍就會進入滿洲國。可是在反應上，史大林總是否認蘇俄有企圖干預中國對滿洲的主權，或其他中國領土的主權。史氏還說，蘇俄對中國並無領土的要求，即是新疆亦然。而且他正要進一步與中國蔣委員長交涉，而非與中共接觸。此在美國官方的紀錄中，便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史大林元帥說，他對任何中國的領袖所知甚少，但對蔣委員長，則感覺是最傑出的領袖，而且是一位從事統一中國的人物。他不能看出，尚有其他可能的領袖；舉例來說，他並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能如蔣委員長統一中國。」

哈里曼又向史大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蔣委員長的政府，可否在以前蘇俄紅軍所進駐的滿洲地方，設立行政機關的地方政府？史大林竟毫不含糊地說，在滿洲境內一如中國其他地方，凡蘇俄紅軍離去時，皆可由蔣委員長設置中國的行政機關。

另外一個主要問題，也使哈里曼特別憂慮，因為在雅爾達會議時，對中、蘇的戰後關係，並未加以研究解決。史大林對滿洲有關權利的要求，須在他給與堅定承諾對日作戰之前，就要加以磋商。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杜魯門總統接見中國外交長宋子文，特將雅爾達祕密協定這一文件的詳情內容，給與宋氏；而同年六月十五日的重慶，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也將一些有關雅爾達的祕密協定的內容，告訴了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知道這個資料後，神情平靜，誠如哈里曼在雅爾達會議時，他曾將其個人的預見，告訴羅斯福總統，就是日後很難遮蔽蘇俄所要求的那些條件，如主張對滿洲的港口及鐵路的優惠權利，租借旅順港為蘇俄海軍基地，而此兩者行徑，皆似過去歐洲列強以條約控制中國埠埠，如出一轍。稍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由重慶給華府一個報告，此報告又輾轉送到哈里曼手中，大意如下：

「我深信中、蘇兩國，將可迅速達成一項協定。雅爾達協定中的兩個字眼『優惠』（Preference）及『租借』（Lease），仍然引起最大的困擾。中國政府將竭力謀求與蘇俄達成一般協議，而不願達成中、蘇之間的特別協議，中國政府也希望避免使用有關領土完整與獨立主權相抵觸衝突的文字，不要只顧遵照雅爾達的協議事項。」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飛抵莫斯科，他銜着蔣委員長的命令，與史大林磋商蔣氏所不同意的條件。宋子文在克姆林宮與史大林逐日商討中蘇如何達成協議的問題，其中對外蒙古問題，是第一個爭執的焦點，史大林堅持中國必須承認外蒙的獨立。雖然此點在雅爾達協定中，並無要求超過承認外蒙的現狀之處，惟基於外蒙原為清朝皇帝治下的一省，在三十年前，就一直成為蘇俄保護下的自治省。故承認大蒙古的現狀，尚屬重新肯定此一歷史事實；而強要中國承認外蒙獨立，無異暴露了蘇俄對中國得寸進尺的野心。

宋子文對史大林表示抗議，認為割讓外蒙古，勢將影響中國政府的生存，因此也要廢棄蘇俄在「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二四年所承認的是項權利要求。宋子文曾就此事對哈里曼作一解釋，他說：「此事在中國人民的心裡深處，係涉及原則問題，當他們承認現在他們不能對外蒙行使宗主權力時，中國人民絕不會支持一個主張永遠放棄這塊領土權利的政府。」

哈里曼後來追憶此事，有謂：「我發現宋子文在某些事情的顧慮上，絲毫並未困擾我們。他感到要史大林承認蔣委員長的國民政府對東北所行使的主權，乃屬一項不同凡響的成就。宋氏却極少掛慮我們所一直憂心的細節，例如究竟由中國的軍隊抑由俄國的軍隊，來捍衛滿洲的鐵路，以及大連港的主人是中國還是蘇俄等等。我幾乎

每天都可以遇見宋氏，並且鼓勵宋氏要更為堅定些。」

波茨坦會議的錯誤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哈里曼離開莫斯科赴柏林出席波茨坦會議時，宋、史兩人會議尚未結束。宋氏感到與史大林的協議中，尚有若干主要的困阻，乃亦束裝飛返重慶，將與史談判經過，報告蔣委員長，並向蔣委員長請示機宜。波茨坦會議結束後，宋子文又飛往莫斯科繼續進行中蘇未了的談判。

波茨坦會議中，首先達成協議的，是設置一個外長會議，開始着手和平建設的工作，中、法兩國也應邀參加外長會議；此一外長會議負責草擬對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的和約，惟對德和約，則須延遲到一個合於理想的宗旨的德國政府成立，方可為之。其時德國人民，則為盟國視為被征服的人民，接受四強軍事的管理，明國在柏林成立一個「聯合控制協會」，定期舉行會議；隨時討論商決對德和平問題。

其次，關於使用原子彈問題：哈里曼有這個問題。史汀生滿腦掛念原子彈，他憂慮這種新武器所蘊含對人類危機，史汀生是一位政治家，他甚至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前，也就是日本廣島被原子彈摧毀以前，他就認為美國的領導階層的領袖們，有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使這種可怕的武器，能够予以掌握控制。如今回顧過去這一件事，由於庸俗，不無乏味之感。假使我們已知一

九四五年的某個清晨，原子彈試爆成功，並且能夠派上用場：我還記得李海上將會以一集廣告和我打賭，他認為原子彈還用不上戰爭。同樣的無稽之談，便是一些史學家們相信杜魯門要拖延波茨坦會議，為的是想將原子彈爆炸於波茨坦會議結束之前，以之作爲在波茨坦會議上對史大林的某種壓力，實則杜氏的作風並非如此。」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杜魯門與史大林在波茨坦會議進行中的休息時間裏，兩人一邊漫步，一邊閒談，杜魯門無意中向史透露美國已擁有一種非常破壞力的新武器（指原子彈），史當時對此並無特別興趣，只是表示他欣聞此事，認爲此種武器將可用以對付日本。由於杜魯門將美國擁有原子彈的祕密，向史透露，所以在波茨坦會議稍後，哈里曼看到莫洛托夫時，莫洛托夫也未顯示極大的驚奇之感，只說美國人想對原子彈保密，現在已無保密可言了。至於在杜魯門及邱吉爾的想法，則是一旦原子彈造成，用之對日作戰，自將可以縮短戰爭。尤其此時希特勒已死，第三德國瀕臨毀滅之中，就剩下日本這個作戰目標。所以，邱吉爾在波茨坦會議中，就記下他和杜魯門的這樣一段談話：「歷史的事實不變，總要在事後方能加以斷定，是否決定使用原子彈以壓迫日本投降，已非問題；此刻環坐會議桌前諸公，業已完全自動的、全體一致的、毫無問題的達成了此項協議。」

美國在阿勒馬哥都（Alamagordo）試驗爆破原子弹的一個月之前，杜魯門總統已同意批准了馬歇爾將軍的對日作戰計劃，就是分兩期攻入

日本的本島，以華德克魯格將軍（General Walter K. Rueger）所率領的美國第六軍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登陸日本的九州；四個月以後，再由美國的第八軍、第十軍聯合沿着日本本州的海岸，橫越攻入東京平原。馬歇爾將軍這一作戰計劃構想，估計獲致成功，使得日本屈膝，至少也得挨到來年（一九四六年）的深秋，同時美軍在太平洋各島嶼的跨躍躍進戰中，所遭致日軍頑強抵抗，因而大量傷亡美軍的數字，亦屬令人不寒而慄。據馬歇爾將軍的估計，欲以軍事力量迫使日本投降，若無預備作爲增援犧牲的後備軍隊五十萬人，也勢將難以達成作戰的目標。所幸後來原子弹試爆成功，馬歇爾將軍的這一軍事計劃，也就束諸高閣了。

杜魯門史大林交往

哈里曼在其回憶錄第四九二頁中，提到這樣一個問題，即此時盟國並無進一步軍事理由要求史大林，參與遠東的作戰，同時，盟國亦無法阻止蘇俄在最後的時刻，基於蘇俄本身的理由介入戰爭。這的確是個矛盾衝突的問題。

世界戰爭的大勢，演變至此，日本的天皇、首相及廷臣多已感到帝國因軍閥興戰招致危亡的厄運，業已來臨；他們仍想在搖搖欲墜的危亡中，作最後的掙扎。於是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乃派遣太子作爲和平使者赴莫斯科，乞靈於史大林爲之調停以中止戰爭，並且磋商和平的條件。史大林乃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將日本外相給他的備忘錄及日本天皇的求和手書，複印一個副本，

知會杜魯門總統，並且也告訴了邱吉爾、史大林又向邱、杜請教，他究竟應如何處理此事？然而日本天皇對美國及英國堅定主張日本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感到憂疑惶惑，同時他已感到日本在無條件投降外，亦祇有爲了「日本祖國的生存及光榮」而繼續作戰。

史大林又請教杜魯門總統對日本天皇求和的手書，應否作覆。杜氏告訴史大林，他對日本民族缺乏誠意，殊不信任。後來史大林向杜魯門建議佯作軍事演習，再覆函日皇，告以日皇太子此行所負任務使命的特質，並不清晰了解，而使日本又「平靜地沉入夢鄉」，杜魯門遂同意史大林的作法。

大約一週後，杜魯門總統及其高級幕僚們，就草擬了一份對日最後通牒，準備在他們離開華府之前，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杜氏希望這份文件，由波茨坦發出，代表盟國對日所採取的聯合一致的行動。史汀生及貝爾納斯兩人，在此嚴重時刻，却尖銳反對此項舉措，何以故？因爲美國的作戰部長一向堅持，在寫入宣言的文字中，必須保證日本戰爭失敗，仍要能够維持其天皇制度的存在。而且這樣的做法，也能滿足日本人民避免羞辱的需要，同時也可順利促使日本提早向盟國投降，不必對日必需使用原子彈。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國的國務卿及聯合參謀首長們，又反對在文件中提及日本的天皇制度。應讓日本人自己決定他們是否還要擁有一位天皇。雙方爭論不休，國務卿貝爾納斯惟恐因涉及日本天皇一事，而發生分歧意見，乃欲避免提及此事爲上策，

結果，貝爾納斯得到勝利。

後來，這份對日本的最後通牒，獲得中國蔣委員長及英國邱吉爾首相的同意，終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從波茨坦發表開來。可是，這份重要文件，並未諮詢蘇俄的意見，因爲蘇俄曾向盟國保證將在兩個星期內，對日進行軍事作戰。

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當時有這樣的想法，他認爲如果情勢可能，他寧願無需蘇俄的對日參戰，即可結束對日的戰爭。所以波茨坦宣言乃要求日本政府接受無條件投降，並警告日本如拒絕此項要求，會爲日本整個國家立即帶來毀滅。在宣言中，並未提到日本天皇制度的將來，僅有承諾謂盟國佔領軍隊，將儘快自日本本土撤退，祇要日本能在和平與負責情況下建立了一個能够自由表達民意的政府。此外，並未對日本特別警告謂盟國儲備更多新式可怕武器，祇是暗示盟國擁有不可測度的强大毀滅威力，尤其超過前此摧毀德國本土的威力。

波茨坦宣言原子彈

美國杜魯門總統此時在對全球的廣播中，又將波茨坦宣言的精義，重加闡述，意在促使日本懸崖勒馬，在第一顆原子彈投向日本本島前，能够結束戰鬥。關於這一點，當時亦有理由懷疑日本政府是否真正理解宣言所揭示兩個可怕途徑的選擇；或謂其中暗示的語句，像盟國擁有不可測度的强大毀滅威力，遠超過前此摧毀德國本土的威力，是否過分玄妙，令人不易測度；或謂在語言的翻譯傳播中，有若干的真意，並未譯出，而

使日本政府的決策錯誤。

當時，日本的首相是鈴木海軍大將（Admiral Baron Kantaro Suzuki），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在東京舉行新聞記者會議上，發表了他反對盟國對日最後通牒的意見，他認爲盟國宣言中，毫無新義，因爲根據設在華府的對外廣播新聞服務處的譯文，其中增加了一段文字：「此外別無良法美策，祇有不管一切的毅然戰鬥，以勝利終結此次戰爭。」（There is no other recourse but to ignore it entirely and resolutely fight for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is war.）日本各界如學者、外交家、新聞記者，他們對鈴木首相當事實上打算拒絕盟國的最後通牒，抑或如當時日本的外長東鄉（Tōsō）想誘蘇俄代爲謀求調停戰爭較有利的條件；大都表示了他們不同的意見與爭論。

美國杜魯門總統，後來閱悉日本鈴木首相的斷然否定的聲明；知道此事已至最後關頭，別無選擇餘地；他乃下令美國戰略空軍部隊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後，在遠東太平洋上空天氣許可狀況下，儘速向日本本土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同年八月六日，也就是杜魯門總統自波茨坦搭乘軍艦返回美國旅途的第四天，他收到作戰部長史汀生達成任務的報告：「華府時間，八月五日下午七點十五分，巨型的原子彈投落日本的廣島；最先收到的報告，指出完全勝利成功，較之早先試驗的威力，更爲驚人。」此刻，杜魯門總統不禁面對環繞他左右的海軍僚屬大聲脫口說出：「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也是我們歸國返回家園最

好的時機到了。」

此在哈里曼回憶錄第四百九十三頁中，我看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哈里曼在波茨坦會議最後幾天中，他特別身負了一個主要任務，就是關於中國戰後與蘇俄所牽涉的若干問題的協調；當哈里曼和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重返莫斯科與蘇俄再開談判時，俄國在同年八月八日（八月五日，美國已向日本廣島投下毀滅性的原子彈）才公然決定進兵中國的東北（日本所卵翼的滿洲國），哈里曼感到華府此時對此事，應予堅定支持。而且哈里曼在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曾有一備忘錄提醒國務卿貝爾納斯：

「中國的處境，尚非孤立無助，以容忍蘇俄當前若干誇大的要求。迨自美國牽涉雅爾達協定有關中蘇和解問題的決議，我相信，此乃羅斯福總統就盟國的利益，以提出其個人對雅爾達協定的解釋，特別有關中國大連港及東北境內鐵路的營運安排的不同意見。我擔心若非這樣做成，宋子文將被迫造成若干讓步，此不僅有違美國對華的基本政策，亦且違背美國國家的利益。」

在此一同時，哈里曼並特別強調，他曾勸史大林將本年五月間霍浦金斯訪俄時，史對霍所作的口頭承諾，說蘇俄將會支持「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特別適用在中國的東北；把這句話，寫成書面，做成紀錄。哈里曼乃認為此項紀錄在實效上，可使美國獲致機會直接與蘇俄交涉，以致史大林在前述承諾地區濫用若干新增的特權。

國務卿貝爾納斯對哈里曼的提醒，竟然置之不理。及至時限將屆，貝爾納斯將欲飛返華府時

中
外
雜
誌

哈里曼乃展紙寫下幾條重要意見提示，他亟欲

美國國務院以此作為對抗史大林對中國提高需求要求的辦法，並且將這幾項重要個人的提示意見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送交馬秀斯博士（“Doc Matthiess”），此人堪稱為美國惟一的歷史證言人，因為當年羅斯福與史大林兩人面對面討論遠東問題時，除包蘭（Bohlen）曾任美國駐俄大使，在場外，還有馬秀斯博士。哈里曼所陳述的幾點個人提示意見，就是指出當年在雅爾達會議上，那幾項是羅斯福總統所同意的，那幾項是羅斯福總統所不同意的，所以被認為具有絕對的權威性。

哈里曼在八月五日，向國務卿貝爾納斯請求賜還他個人的那幾點提示意見，結果貝氏覆函哈

編

輯

報

告

編 者

血苦戰經過作翔實明確的報導，為現代史增添了不少珍貴史料，值得細讀。

△本期又因稿擴更兼排印不及，「東北壯遊」、「華北學生戰時西南行」等篇均延至下期刊載，敬請讀者作家鑒諒。

△編者因患風濕、血壓高，近半年來疏於督導印工作，尤未能向作家讀者通訊問好，幸承作家愛護支持使本誌仍能保持每月提前出版的優良紀錄。在此舉世經濟蕭條，出版事業不景氣聲中，我們這一本純民營的期刊，沒有任何背景，不投機取巧，仍能日益茁壯，在此特別要感謝萬萬千正義的高明的讀者大力支持，今後謹當振作精神，暢奮發，繼續努力，益更加強內容，擴大發行，不負

中外廣大讀者的雅望。

里曼，提到他此刻正與杜魯門總統搭乘奧古士塔號軍艦返航美國途中，他們站在船艙的甲板上，幾乎是一再逐字揣摩他的意見。哈里曼（適為美國駐俄大使）乃知他個人的意見，已被重視，乃立即在莫斯科轉告史大林，謂宋子文業已對雅爾達協定的要求，盡可能作了最大的讓步；祇是杜魯門總統希望史大林毋再對宋氏相逼過甚；同時也指出羅斯福總統，曾經否決推翻了蘇俄的原始提案，即要租借中國的大連港，因為羅氏堅決主張將大連港國際化，作為一個自由港，來代替蘇俄的提案。並且明白告訴史大林，說杜魯門總統對史大林書面寫下保證支持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感到欣慰，同時將史大林這一書面的保證文件，於中、蘇協定簽訂之日，對外發表公佈。

△前農復會秘書長、現任行政院經建會副主任委員謝森中博士與沈宗瀚先生從游多年，對沈先生的「識人、用人、容人」知之甚深，特地為中外雜誌撰寫「憶念沈宗瀚先生」，至情至性，流露於字裡行間，令人讀來深切感動。

△二次世界大戰率軍遠征緬甸的名將廖耀湘將軍，在東北戡亂最後一戰中，不幸失敗被俘

傳語家人子弟追隨政府報效國家，足見廖將軍心向政府，崇敬領袖，始終如一，未嘗稍變，少數不明真相或別有用心之輩，對廖將軍戰敗被俘多所詆毀，戰史作家劉建章將軍、李珍將軍、蔣繼志先生等為廖耀湘將軍伸冤辯護，特撰「國軍印緬血戰記」及「追懷廖耀湘將軍」，就廖耀湘對抗戰戡亂戰役浴